

文学批评的当下状况与价值重构

◇ 刘家民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生成的元思想

从表层看,能够成为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思想很多。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启蒙思潮、科学观念、民主观念、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群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文观念、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在百余年的文学批评中,大量的西方思想被引入中国知识界,再加上传统的资源,有非常丰富的“知识”性思想可能成为文学批评价值的依据。然而,百余年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势导致这种思想的“喧闹”只是表面的现象,在社会政治与历史的选择下,只有少数的思想能够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我们认为,左右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思想有表层与深层之分,表层思想是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直接来源,而深层思想则是决定如何选择、实践表层思想的始源性资源,我们称之为“元思想”。“元”,英译为meta,意为基础性存在,元思想是指建基于具体思想之上的根本性思想,在本文中则指左右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基础性思想。

我们认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元思想主要有三种:政治思想、科学思想与人文思想。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取向上,尽管有过启蒙、救亡、革命、民主、大众、进化、审美、现实等鲜明的价值立场,但在其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基础制约性,换句话说,三者建构了百余年文学批评的价值基础。然而紧随的问题是,政治、科学和人文与价值标准之间并不是直接对应,它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最终成为价值标准。那么科学、人文、政治等三种思想能够成为何种价值标准呢?科学、人文与政治自身蕴含了三种主要价值标准。科学以探求真知为自己的使命,其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在近现代尤为世人推崇。人文精神侧重对人精神世界的研究与引导,审美是其首要的价值取向。由此,人文思想主

导下的审美价值特点就显得颇为复杂,需要仔细面对。政治虽然常常在实践中体现出“强制性”的行政化色彩,但当其体现于文学中时,主要体现在教育(教化)价值上,它通常以意识形态教育来实现。统观科学、人文与政治的价值导向,认知、审美与教育是最主要的价值导向标准。考察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认知、审美与教育也是其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但我们还需要思辨的是:科学、人文与政治作为价值标准的元思想,三者的主次关系如何?从文艺自身的维度来看,审美是最主要的文艺属性,居于首要地位,紧随其次的则是教育与认知,这样就形成了人文、政治与科学的相应次序。但是这一排序并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现实形势而发生变化。从中国百余年历史形势审视,现实状况决定了功利性价值的盛行,与其相应的则是政治与科学地位的凸显,尤其是政治,因其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在百余年的文艺批评中具有其他元思想难以比拟的优势,而蕴含审美价值的人文思想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才真正被人们重视,由此形成了政治、科学与人文的先后序列。

二、元思想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建立

在百余年的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建构中,政治、科学与人文精神作为始源性思想共同建构了百余年的文学批评价值标准格局。它们的很多思想元素虽然多来自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并且主要为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与社会问题,但在实际的运用中都不同程度地印上了中国化的特色,文学批评领域当然也在此列。

(一) 政治思想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取向

从晚清的梁启超开始,政治就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旨向,梁启超希望以此达成某种政治目的。“五四”时期人们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激烈而决绝的批判,而他们所欲求的“新文化”则与政

治革新有着内在目的的一致性。陈独秀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宣扬文学革命,与陈独秀相近的还有李大钊、周扬等;而其他的作家与批评家,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傅斯年、茅盾等,则意图以文学上的启蒙影响政治。1928年左右开始的革命文学以及随后成立的左联,则直接将文艺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宣传性、阶级性、战斗性等批评观点,主要产生于文学论战,但在较大程度上对文艺进行了政治化评价。抗战文学批评以及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延续了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思想,而且还将“政治标准第一”作为文艺评价的“标准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艺评价的政治性被不断强化,这种趋势虽有反复,但始终是主导趋势。新时期以来,许多文学批评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文学评论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辩,与80年代借政治形势进行“重释政治”不同,这时的批评呼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新介入,并且在世纪末形成了讨论批评“再政治化”的热点。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价值与政治的关系得到深化与拓展,学人们有感于纯文学的诸多问题,提出对文学的“人民性”与左翼批评传统、延安文学批评的重新阐释与再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流行于文学批评界的后殖民、生态、文化、族裔、女权等批评方法与实践均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政治基础内在地理地回应了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上述我们对政治思想建构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论述,既是在时间的坐标中对政治元思想的梳理,又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百余年风云变幻的社会转变与政治发展历程。可以说,在每一次政治的转变中,政治的外在制度与内在思想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这一切又很快会转变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虽然伊格尔顿宣称一切文学都是政治的,但政治对文学具有如此鲜明、直接、巨大效用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的显著特色之一,这一点也很大程度导致了在百余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不断出现一次次的论争、批判。

政治思想下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取向呈现出实践特性。政治影响文学与文学批评,可通过思想的形式,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的实践过程。然而,百余年的文学批评给我们带来的是另一种印象:文学与文学批评对政治的介入。百余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导向,都含有以文学达成现实欲求与愿望的倾向。以政治思想规约批评、以批评宣扬政治原本是正常的批评实践,但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的政治限度往往会越过正常的界限,这一点需要我们反思。

(二)科学思想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选择

科学代表了先进和竞争。百余年在与西方诸列强的战争与交流中,中国与其形成了对立的两极: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感性与理性、专制与民主……有识之士们逐渐意识到差距源于科学与民主的差异,因而改变中国亟待二者的发达。科学精神对于国人而言,不仅是国家强大的物质动因,而且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与诱惑下,各种“先进”的思想被引入中国。

科学思想广泛、深入地制约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百余年的文学批评价值轨迹显示:社会功利性与审美性始终是价值取向的核心元素,而在这两种价值取向中,“科学精神”都极为凸显。文学批评的功利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为民族国家与个人服务上,为实现这些目标,人们引入了多种新思想。为何要引入?除了因这些思想流行于西方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被当时的许多国人看作科学与“公理”的代表,而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科学”即是承载着公理与进步的巨型概念,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基础性思想。换句话说,科学的公理性特征尽管广泛用于自然领域,但它被渴望迅速改变现状的国人转用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人们认为:只要找到了“规律”(科学),民族国家与个人便握有了希望的秘匙。这种科学理念虽在后来有所修正,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然,有些批评成果只能算是从自然科学嫁接或移植后生成的“社会科学”。

科学思想融入到审美性价值批评。审美性侧重文艺自身特性的审视,但在人们进行的“审美性”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科学精神渗透。渗透通常表现为如下形式:以科学精神作为一种比较视域,从而在对照中建立审美性价值标准;以科学精神为价值依据直接运用于审美性批评;以科学精神要求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价值的科学影响还体现于批评实践的科学化思维方式。现当代文学批评由于受到科学思想的影响,其批评实践开始大量以科学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与传统的文艺批评相比,现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开始出现如下特点:“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实证的特征;在概念范畴上则力求遣词造句的严密准确,使之具有稳定性、精确性和解析性。”

(三)人文思想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导向

文学自身特性与社会的需求呼唤批评价值的人文思想。文学作为表现人的艺术,“人”的一切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其写作与批评的重心,而人的精神世界尤为重中之重。在文学的自身特性下,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给人阐释“真”的一面,而且还应该对人的精神世界有所助益,也即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追求。与此同时,社会的现实形势也要求文学批评的人文精神介入。晚清以来,有识之士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倍受欺凌,是与人们精神的麻木与落后分不开的;几乎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与人相关的问题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可以说,人的精神状况是整个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最显著症状,而对于坎坷曲折的近百年中国来说,人文精神的诉求有着更为现实、特殊的意义。

人文精神贯穿于近百年的文学批评价值。晚清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人文倾向。梁启超影响深远的“新民”说、王国维以康德与叔本华思想对人生的阐释、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倡导等,无不显示出对“新人”、“新的人生观”的希冀。“五四”时期的启蒙等思潮,在“人的文学”的大旗下,通过批判封建社会对人的精神禁锢、宣扬人的主体自由以及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使对“人”的探求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虽然“革命”与“救亡”等价值有着更为强大、更为现实的影响力,但人文思想依然是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批评重心。京派与海派的文学论争已属关于“人性”探求的经典学案,而在左翼内部,茅盾、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鲜明的“人”性元素。茅盾的很多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都会评判作品中“人物”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依据则是源自人物自身的特点;胡

风的文学批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人所知,它不仅是对作家本人的规定,更是对作品中人物精神世界的要求。换句话说,在许多左翼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中,文艺的政治性不能公式化、概念化地体现在人物的身上,作品中的人必须是有着自己内在灵魂的“活”人。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之前的这段时间,钱谷融、秦兆阳以及邵荃麟等人对文学的人文内涵进行了深刻探究,即使是那些所谓符合要求的批评成果,虽有极端、机械的人物特点,却体现出这一时期独有的人性乌托邦诉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对人性世界进行的各种探索;另一方面也对如何深入进行人性开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关于“人道主义”、“主体性”、“新人文精神”与“新理性精神”等的学术争鸣。进入21世纪以来,人文思想对文学批评的作用又被学人们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一方面人们通过批评实践呼唤文学创作的深层精神书写,倡导文学批评的生态、叙事伦理、文学伦理学以及核心价值观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更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缺失进行反思性研究。可以说,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导向的“文学批评的批评”正在深入进行。

人文精神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导向主要体现在以审美价值为基础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价值评价体系。文学批评的引导和规范,首先体现在价值观念上。如果说政治、科学等已经对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在认知和教育上进行了明确而集中的引导,那么人文思想则鲜明地体现为将那些抽象、枯燥甚至机械的认知、道德、伦理等思想以审美化的氛围加以润饰,从而实现上述价值的特有“趣味”。这样,人文思想制约下的文学批评价值就体现为以审美价值为主导并蕴含其他多种价值元素的复杂价值熏染体系。现当代文学批评以人文精神为取向去评论文学时,批评主体有关文学的人文价值观念时如何得以形成呢?从知识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批评主体从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等领域中所吸纳的人文思想,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对人文精神内涵的革新作用。丰富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人性的多样,也预示着人文精神的多元,而那些勇于创新的文学创作更是对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

既通过对作品的批评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质,又在不经意间携带了文学作品不健康的人文杂质。

人文思想取向深刻改变了文学批评价值的气质与面貌。人文思想下的文学批评价值,以文学作品审美特性的阐发为核心,而又将其他价值思想兼容其中,由此形成具有“诗性正义”特色的批评特质。在百余年的文学批评中,那些经典的文学批评既呈现出优美的诗性特质,同时又蕴含丰富,在美善真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然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近百年的人文价值批评带有显著的社会功利性色彩,这一状况无疑要求我们在研究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时采用更全面的视域,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现当代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反思

当下人们感受到文学批评价值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文学批评受市场化、商业化作用出现价值虚与价值混乱;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与实践的脱节导致价值无力。然而,文学批评价值的紊乱主要与批评者们的价值观念有关系,而价值观念又离不开其生成的思想基础。在此意义上,对文学批评价值问题的反思,更应该在元思想层面进行。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指出,价值观念与价值标准有时候也需要外在体制的约束,如健康而适度的批评制度的创建对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与标准显然很有意义,但这里主要集中于对内在批评思想层面的研究。

(一)文学批评价值的一体化

政治影响了文学批评价值的思维方式生成。政治本身即具有鲜明的“功利”诉求,简言之,政治是与个人或群体的特定“利益”紧密相关的。格尔兹曾指出:“利益理论指出,思想是武器,而将一种特别的现实看法——无论是本群体的、阶级的还是政党的看法——制度化的最佳途径,就是夺取政治权力并强制实施它,由此,它把政治思想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贡献是恒久的。”政治利益的“斗争”性也深深作用于现当代的文学批评中。纵观百余年的文学批评史,除各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外,为实现各种“政治利益”而展开的各种论战使得文坛如战场般硝烟弥漫,批评家们则变成了以笔为枪的战士。在政治指向下,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政治的“斗争”思维,而这种状况在较长时

间内左右着现当代文学批评。

政治思想引发了文学批评价值问题。当政治成为主导性的批评价值标准时,其出现的问题也较为明显。一是一体化的批评思想与实践。在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由于特殊社会形势和政治局势的影响,文学批评一度几乎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任务的工具,评价的价值标准也主要是对政治标准的挪用。这种情形在新时期以后有了较大改变,但其潜在的影响力仍不时显现。这种政治中心的批评带来的最直接问题是文艺批评价值的一体化、对文学自身艺术特性的漠视和偏离。一体化指一切都要符合政治这个大前提,文学批评价值因此变得单一与排他。即使在今天的多元价值环境下,少数批评家依然受政治左右,奉单一的政治价值为圭臬,不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其他的批评标准。二是新时期以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被重新建构,但一些文学批评标准呈现出“去政治化”倾向。一段时间内,脱离了政治约束的各种批评价值纷纷浮出,价值泛滥与价值虚无为批评实践的重要表征。与“消解政治”相伴随的是“躲避政治”。新时期以来有一些作品直面社会问题,而批评家们不愿在批评领域里涉及过多的“政治”话题。有不少批评文章即使意识到了作品的“政治”问题,也因其相对的“敏感性”而不愿置喙。

政治思想与文学批评价值关系需要更审慎地思考。政治思想虽然给文学创作与批评带来了负面因素,但这不能抹杀它积极的一面。文学作品是文学批评的文本依据,人们对特殊历史时期文学批评价值的政治性也应具有肯定性的认可,而那种机械、僵化的政治性批评则是人们极力批判的。在新世纪批评价值出现问题的状况下,我们有必要再重新反思其与政治思想之间的深度联系。

(二)科学迷思下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浅化、僵化与工具化

文学批评价值表现出科学的迷思。迷思源于希腊语 mythos,它表示某种不太符合实际观念。科学的迷思有如下方面:首先是人们建构文学批评价值标准时,对科学抱着一种极度信服的态度,却缺乏对二者关系进行透彻辨析,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其次,当人们以“科学”去定性很多批评标准时,过于信

服与乐观,而对科学自身缺乏足够的省察与批判。再次,面对这种迷思,人们多倾向于从西方选取资源,带有一种强烈的崇洋色彩。

科学迷思导致了文学批评价值问题。概括来看,科学迷思易导致浅化、僵化与工具化的问题。浅化是指人们在选择文学批评价值时,极易把某种科学“规律”、“真理”直接确立为评判性价值标准。这种以“科学”为评判标准的现象在百余年的批评史上屡见不鲜,由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僵化是指受科学思想的束缚,在批评价值标准方面呈现出片面求真的状况。科学以求真为精神旨向,而“真”常表现为对“物自身”的探究。这种倾向对文艺批评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文艺现象,尤其是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学界常称之为“内部研究”或“形式批评”,新批评、结构、解构以及叙事等方面的批评就是典型的代表。工具化则指人们往往将科学看作能立即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在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以科学为价值导向的意图是对现实迫切问题的解决。这样,以“先进”、“有用”、“公理”等为前提时,科学的“工具理性”层面就会被强化。

科学思想下的文学批评价值取向需要合理的人性元素。科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无可避免,而文艺批评在受其作用时,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所取自的思想资源,不仅不能将某一规律视为唯一,而且还需要在深切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自觉地以合理的人性价值反思科学的工具价值。或许如此,文学批评才能不被科学思想所异化,而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价值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效力。

(三)人文迷失下文学批评价值的单面、泛化和理性缺失

人文思想视域下文学批评价值面临选择困惑。无论人们对“人文思想”或“人文精神”作出怎样的诠释,“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无疑是人们界定与理解人文思想的核心。“人”的类别、个体、族裔甚至时空的多样性,自然引发出人文价值选择的多元性。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文学批评价值的人文性常常处于受压抑或缺失的状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人文迷失导致了文学批评价值问题。百余年来

人文精神几乎总是处于迷失状态,迷失主要是指在文学批评中“人”较少被合理地对待,由此引发了文学批评价值的单面、泛化和理性缺失。单面是指人精神世界的单一性,在百余年的价值标准上,人往往被批评者们视为“单面人”。在实际的文艺批评中,人们往往以一种主导性的单一的精神特质对人物进行评价,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相关的说法也有相应的改变,但不变的是对人物的单一性评价。即使在当下的批评中,对人物内在复杂性的论述还是相对缺乏。其次,人文批评价值的泛化。随着新时期以来各种新的文学知识的涌入与多样性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价值泛化的问题也随之凸显。泛化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各样的创作都有较大程度的肯定性评价,甚至对那些基于人的生理欲望,尤其是性需求的书写也不乏认可,由此导致了评价标准中物质(身体)维度的强势、精神维度的萎缩。很显然,文艺创作中的这些低俗的现象本应通过文艺批评加以纠正,但现实状况是文艺批评的价值引导软弱无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再次,人文迷失还导致了理性精神的某种缺失。所谓理性缺失,主要是批评主体受社会形势影响,导致对理性的重视不够,由此出现精神维度的浅表化、庸俗化。

人文思想呼唤多样性、有深度、有主导倾向的文学批评价值。文化人类学界曾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主张对他者文化的尊重,而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仍深感其中的不足,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深描”与“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当以人文思想为元思想的文学批评确立具体的价值标准时,我们需要警惕标签式批评、泛化式批评以及理性缺失式批评,而注重人主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丰厚性是批评需要着力开掘的方面。除此之外,在今天价值泛化的状况下,批评需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责任担当,积极地以正面、合理的价值去纠正那些不良的人欲倾向。

作者简介:刘家民,文艺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讲师。

(摘自《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原文约10000字)